



【细 节 见 证 历 史 · 抗 日 战 争】

九一八

【事变背后的角力】

常钺 饶胜文◎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细节见证历史·抗日战争

九 一 八

事变背后的角力

常 铖 饶胜文◎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 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一八 / 常钺, 饶胜文著. —北京: 中共党史出版社, 2005. 8

(细节见证历史)

ISBN 7-80199-247-4

I. 九... II. ①常... ②饶... III. 九一八
(1931) - 史料 IV. K264. 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2772 号

书 名: 细节见证历史·抗日战争·九一八

作 者: 常 钺 饶胜文

责任编辑: 刘朝春

出版发行: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

邮 编: 10008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开 本: 16 开 720 × 980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5.8

印 数: 5000 册

版 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99-247-4/K · 187

定 价: 118.00 元 (全四册)

此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。

电话: 82517249 82517244

目 录

引子：走近事变背后的角力.....	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1931年9月8日

日本在反华喧嚣中蓄势待发	8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日本阁议中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就范的意图，十分明确而刺眼。一场为维护帝国在中国东北利益而不惜一战的喧嚣，正在整个日本岛酝酿升腾。

大水把国民政府冲得摇摇晃晃	1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在国民党中央的文告中，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称作“国难”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南京国民政府在面对外来威胁时，更加显得底气不足。

1931年9月9日

驻日公使很乐观22

蒋作宾面露笑容地对记者说，在南方，对中村事件并没有像你们北方传得这么邪乎，你们要注意舆论导向哟！不料他刚刚行至汉城，就传来了事变爆发的消息。

钟毓却感到山雨欲来28

毕竟有人感到局势的紧张。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认为，中村失踪案在万宝山事件后接踵而至，是日本有意寻衅、步步紧逼的结果。

1931年9月10日

两个并立的国民政府34

蒋介石下野了。可短短半个月，广州方面就不得不电请蒋介石重返南京，共商大计。就在这天下午二时许，日军占领锦州。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全部沦陷。

1931年9月11日

编遣与川军42

川军缩编方案交至南京。一周后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编遣不了了之。日后，正是这支装备奇差、差一点就被编遣的军队，为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

1931年9月13日

张学良要彻查中村事件48

张学良想通过彻查的姿态，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，再一次躲过关东军在东北动武的企图。不过，这一次他没有成功。

战争动员令已悄悄下达53

“万一事件发生之际，各部队应主动采取积极之行动，要有务期必胜的决心与准备，不可些许失策。”——本庄繁对关东军的这番训话，不啻是一篇战争动员令。

1931年9月14日

重光葵的艰难使命60

在那个战争机器已然发动，而政府只能跟在帝国军人后面加盖图章的年代里，重光葵之类的日本职业外交官的使命，注定是艰难的。

中国当选国联非常任理事国65

国际地位是争出来的，不是选出来的。事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要到国联去讨个说法时，“弱国无外交”的辛酸又一次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。

1931年9月15日

日本解决“中国问题”的策略71

那时的中国是弱国，但惟有其大，也令日本头痛。于是，每当中国出现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势力时，日本总是会“热情”地跑去支持一把。

溥仪在天津的生活77

25岁的溥仪并不具备成熟的政治头脑，而惟独对宫廷生活的高贵与奢华念念不忘。当有个机会能令昔日重来时，他便毫不犹豫地投向日本人的怀抱。

1931年9月16日

陆军中央部向关东军派出特使84

日本陆军派出的特使，是一个十足的主战派；此前，他们已加强了关东军的军事配备；事变爆发后，他们却声称纯属关东军的“擅自行动”——历史竟是如此的吊诡。

1931年9月17日

北大营成为“孤岛”92

关东军沿着南满铁路完成了军事部署。考虑到这些据点依托于铁路所具有的军事辐射力，那么完全可以说貌似兵力强大的北大营已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。

不可能完成的任务97

日本政府没有力量与决心挑战军方在对华政策上的主导地位，但是直到外交交涉行将破产、事变行将爆发的前一天，他们还想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1931年9月18日

北大营、沈阳在坐以待毙中沦陷103

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关东军不少的战术设计落了空，他们甚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些许茫然，觉得很不过瘾。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、最屈辱的一夜。

半途而废的督师“剿共”109

事变爆发，才走到鄱阳湖的蒋介石不得不放弃督师“剿共”折返南京；1936年，蒋介石又是在督师“剿共”中，遭遇了“兵谏”——历史似乎总是在捉弄他。

1931年9月19日

不抵抗：一个悲剧性的错误116

一味屈从于人并不能增加谈判桌上的砝码，而只会助长对手得寸进尺的贪婪——这正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们犯下的一个悲剧性错误。

“由本司令负责，干吧！”123

是否在那一刻，个人的成败荣辱和解决满蒙问题的国策，涌上本庄繁的脑际？……在五分钟死寂般的沉默后，少壮军官们终于听到他们的司令官徐徐地吐出了这几个字。

参谋本部的将军们暗自窃喜127

作战课长今村骏心领神会，当即起草了参谋总长致关东军司令官的信。当金谷总长看到这封意蕴深长的妙文时，微笑着说：“让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。”

日本政府仍然幻想“不扩大”133

当森岛守人领事向关东军强调以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时，花谷正少校甚至拔出军刀威胁说：“对于干涉统帅权者，绝不姑息！”

到国联讨个说法.....139

国联所谓“公正”的裁判，任凭中日两国在角斗场上“自行解决”，把侵略视为进攻，把被侵略视为防守，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守，都是“规则”允许的。

1931年9月20日

国民政府从抗日呼声中感到压力.....146

蒋介石总是告诉国人，中国的抗战还需要准备，而且要在统一领导下来准备，可是怎么准备？怎样就算准备好了？他却总也不想讲清楚。

中共对事变作出反应.....150

中共临时中央鲜明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，也通过满洲省委对抗日作出了实际安排，但在王明“左”倾思想指导下，没有能够捕捉到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。

1931年9月21日

蒋介石折回南京主持大局.....156

扬子江上，永绥舰顺流而下，蒋介石沉默无言。事变还是发生了。尽管他力持镇定，但忧色和焦虑仍不免形之于表。

吉林省主席熙洽开城揖盗.....160

当南京的充充诸公号召国人镇定团结共赴国难时，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省主席熙洽已经向进军吉林的日军“输诚”，表示愿意“和平交接吉林”。

1931年9月22日

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？……………166

听意思，似乎“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”的决心，只是蒋介石自己的事，而与普通大众无关。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，在民众面前是苍白无力的。

三个人与一场战争……………170

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组合——石原莞尔、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。这三个名字，不但与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，甚至也与整个日本侵华战争密切相关。

1931年9月23日

蒋介石告诉张学良：一切要听中央的……………179

在电文中一再申明不得自行与日本谈判后，紧锁眉头的蒋介石还不放心，又加上一句：“你们回去告诉汉卿，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。”

纵容使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……………184

暧昧是日本性格的特点——领导人通常不主动表达意见，而是等待部下达成共识，再接纳之成为正式决策——陆军中央部的暧昧，无异于更加放纵了我行我素的关东军。

美国心情矛盾地关注着事态……………188

美国感到了不安，但它并不想和日本撕破脸，它在一如既往地“观望”。10年后，在珍珠港的爆炸声中，美国为自己的“观望”付出了代价。

1931年9月24日

日本政府为军事行动“埋单”194

军方已捷足先登。日本政府很郁闷，它的如意算盘不但落了空，还不得不为军方的行动承担政治后果。

伪政权中的两个中国人198

事变发生后，有不少国民政府东北当局的要员，纷纷投向日军做了汉奸。不少东北的上层人物，早已被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思想洗了脑。

1931年9月25日

苏联政策的明暗两面204

虽然要考虑外交政策的正当性，但斯大林并不打算对抗风头正劲的日本，他更愿意看到日本陷入对华作战的泥沼。除了“声援”之外，中国不可能从苏联那儿得到更多。

1931年9月26日

民众运动正在起变化211

如果说民众对外来侵略的义愤，常常会转化为对政府“不作为”的不满的话，那么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如同催化剂，大大加快了转化的过程。

1931年9月27日

铁杆汉奸张景惠浮出水面217

张景惠的投敌是主动的、自愿的。汉奸们等不及了，他们不但要“响应”皇军的号召建立伪政权，甚至要“箪食壶浆”以迎皇军。

1931年9月28日

蒋介石不得不“节制”民众情绪.....223

民众对政府无所作为的不满与日俱增，蒋介石不得不试图再一次“节制”民众的情绪，使之回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来。但他没有成功。

关东军为“满洲国”造势.....228

在关东军看来，建立“满洲国”并非上策。石原莞尔用“强吞万斛泪水，退到满蒙独立国的方案”的日记，写出了日本军人赤裸裸的贪婪。

余 绪234

引子：走近事变背后的角力

在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，矗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物，叫做残历碑。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开的台历，花岗岩碑体被雕刻成弹痕累累的造型。那上面的时间，永远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。在这个日期的旁边，有一段短促却足以触动国人神经的文字：“夜十时许，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，反诬中国军队所为，遂攻占北大营。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，忍痛撤退。国难降临，人民奋起抗争。”十多年来，每逢9月18日的夜晚，沈阳的上空便会响起3分钟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。

无疑，人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永远地记住九一八事变。可是，是否

我们已经忘却了些什么，尤其是关于那段历史的背景和事变本身的某些重要细节？

细节就那么重要么？是的，没有细节的历史就如同听不到心跳的标本，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存在于细节之中。历史不是泼墨大写意，而是工笔画，只有鲜活的细部，才能构成趣味盎然的整体。

我们或许回避不了这样的问题：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，还能够像残历碑那样把那个日子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中吗？我们还能够真切地找寻到那段历史与今天的血肉联系吗？

让我们一起把思绪拉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。

所谓满蒙者，……广袤七万四千方里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。较我日本帝国国土（朝鲜及台湾除外）大逾三倍。……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，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，世之无其匹敌。……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，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，扩展其规模，完成新大陆政策，……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

这段话出自著名的《田中奏折》，反映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。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个神秘文件的真伪，从那个年代及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处心积虑的侵略和掠夺，完全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国策的产物。可是，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具体背景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。简单说，它是日本内部三股政治力量在一致认同其大陆政策的前提下，又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和利益诉求而角力的结果。

积极筹划和推动事变爆发的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，他们把日本的政治高层和军事高层，看作是老朽腐败的官僚，认为只有迅速在中国东北动武，变满蒙为日本的殖民地，日本才能在大国角逐的国际格局中居于有利地位。关东军是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军，通过武力赢得帝国更大的在华利益，“天然地”符合他们的利益，所以上至司令官，下至基层联队长，都是事变的积极支持者。

限制甚至反对关东军的“激进”态势的，主要是日本内阁。与“不管不顾”的军人不同，他们有更深远、更讲求调子的政策图谋和行动

没有细节
的历史就如同
听不到心跳的
标本。

路线图，也更关注其他列强的反应。其策略，是要把对中国“亲善”的政治秀做足，从而在“不得已”对中国动武时，能够得到列强的谅解。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，但日本政府既无力量也无决心管束“不听从命令”的军队，只能不情愿地跟在帝国军人的身后亦步亦趋。第三种力量是以陆相和陆军参谋总长为核心的陆军中央部，它的态度是最暧昧的。作为陆军的中枢，他们既要维持政策的稳定性，又不能不顾及到海外驻军的要求和利益，军人的本能也告诉他们自己，只有在战争中军队才会成为国家的柱石。所以，事变爆发前，他们优化了关东军的军事配备；事变爆发后，他们又以明抑实扬的方式，为日军军事行动的节节升级开绿灯。

考察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中国的情形，情况似乎简单得多——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，主要的责任人是蒋介石以及严格执行其政策的张学良。这实际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答案。避免与日本开战，这不但是蒋、张的主张，也是国民政府中的主流意见，甚至像胡适、丁文江、傅斯年、陈寅恪之类的知识分子和学者，也持这样的观点。一位专家在仔细讨论了当时中日双方陆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后，结论是如果两国正式开战，中国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军队数量，才可能与日军相抗。当时，蒋介石刚刚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，可实际的情况却是，国民党与共产党激战正酣；国民党内部斗争激化，不但导致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国民政府，双方还兵戎相见；地方势力依然强大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政府叫板；羸弱的中国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灾的打击……总之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与日本在战场上一见高下的力量。

当时，中国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军队数量，才可能与日军相抗。

但是，不抵抗政策仍然是一个基于错误判断的错误决策。国民政府过高估计了日本政府在日对华政策中的分量，总把日本通过其外交管道透露的信息看得过重，而不了解对于日本军队而言，日本政府其实是说了不算的。事变爆发时，国民政府以为只要不抵抗，不给日军以扩大战事的口实，日军终究会受到政府的节制，撤回到满铁附属地去。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决定中国命运、在一定程度也决定着日本命运的九

一八事变，竟以日方“低层”推动“高层”的方式诡异地发生了。不向日本宣战是一回事，不抵抗是另一回事。一味屈从于人，不但不会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分量，反而会助长对手得寸进尺的贪欲。况且，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崇拜强者的特点根深蒂固，在这样的对手面前，表示屈服就可能要面临最可悲的后果。

考察九一八事变还不能忽视国际背景。当时英、法等老牌列强，还深陷于一战后形成的战略思路中，不但看不到日本崛起对其所构成的威胁，甚至还纵容和支持，尤其是英国，它一向把日本看作远东地区的盟友，尽管一些英国政治家并不喜欢日本；美国虽已是世界头号强国，但其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所谓的孤立主义，这不但使其国际战略缺乏远见，而且在行动上往往犹豫不决；至于国联，实质上是受英、法控制的，“老板”不想有所作为，要指望国联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帮助想来也难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对九一八事变的走向和结果影响最大的“国际因素”，是与中国和日本都毗邻的苏联。就战略而言，日本占领满洲，主要是冲着苏联去的，它要在为一场可以预见的与苏联的战争中，为自己赢得巩固的后方和战略纵深。事变爆发后，日本政府最担心的也是苏联的介入，所以狂妄无比的关东军在向黑龙江省方向推进时，竟也逡巡不前，因为北满铁路是苏联的势力范围。斯大林看透了日本人心中的斤两，他并不愿意去挑战风头正劲的日本，而更愿意看到日本在羸弱却又地域广阔的中国泥足深陷，这样，苏联的东面就是安全的。所以，苏联不但忍下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对自己势力的冒犯，甚至连日后的伪满洲国也承认了，并于1935年以1.4亿日元的价格把北满铁路一并卖给了伪满洲国。斯大林设了个大局，日本就一头钻了进去，直到行将战败，也没能发动那场假想中与苏联的决战；而中国，则要更多承受战火和苦难。

当然，九一八还有许多说不尽的话题，它绝非仅仅是一个“悲惨的时候”，也不是像一些西方史学家所描述的，是一场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战争。所以，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，仔细品味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政治角力，不但有意义，而且也不枯燥，只要回忆起那些重要的细节，

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崇拜强者的特点根深蒂固，在这样的对手面前，表示屈服就可能要面临最可悲的后果。

我们就可以读出那段历史与现实的紧密关联。

为此，在本书的写法上，我们作了些新的尝试，未必成功，但求新意。

我们选取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 21 天的历史，通过 38 个具体事件或话题，力求多视角、多维度地展示事变爆发的前因后果和丰富内涵。当然，具体的历史叙事并没有局限在这 21 天，有的追溯甚至到了日本明治维新，而为了照顾到事件的完整性，有的话题涉及整个抗战。在写作中，笔者力图做到以小见大，散而不乱。在选取的事件和话题中，大多数都与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，也有一些话题扯得远些，例如，写到了 1931 年的大水，写到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抗，写到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“围剿”，等等。所有这些，乍看来并不与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，但它们却可以启发人们从更为丰富的视角去审视这段历史，使读者看到一面是国力渐至顶峰、对外虎视眈眈的日本，另一面是国力羸弱、政府脆弱、内部纷争不断的中国。只有了解了强弱之势，才能看懂胜败之机。

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。经过一个甲子的洗礼，世界和中国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。如果对历史的回溯不是发思古之悠情，也不是书斋中为学问而学问的文字，而是为了走近历史的深处，用一程探索之旅、发现之旅来观照现实、展望未来的话，那就让我们以此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，并将这份思考献给正在崛起的祖国。

只有了解了
强弱之势，才能
看懂胜败之机。